



李银河 / 主编

邓晓芒 著

启蒙的进化



重庆

启蒙的进化

邓晓芒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的进化 / 邓晓芒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4
(知识分子丛书 / 李银河主编)

ISBN 978-7-229-06361-0

I. ①启… II. ①邓…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9451号

启蒙的进化

QIMENG DE JINHUA

邓晓芒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 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中

责任编辑: 徐宪江

特约编辑: 杨佳凝

营销编辑: 高 帆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尚燕平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在“乱书渐欲迷人眼”的当下，我们出版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读者能够向理性阅读回归——同时我们深知，出版人有义务引领这种回归。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李银河老师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该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精选十余万字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关注社会、关注思想、关注人生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作品风格各异，有散文、有随笔、有杂文、有回忆录，或向读者传递他们的知识，或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思想，或向读者讲述他们的生命体悟，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启迪。当然，这些文字是作者们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其中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谁，对读者而言亦是见仁见智之事。

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一贯的出版主张。我们相信

这套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希望籍由这套书，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李银河老师为组织、选编本丛书多方奔走，耗费心力甚巨，在此谨致敬意；王水博士、郑红霞老师为本丛书的策划、选编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至为感谢！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批判社会的人。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所有这些定义中，我最喜欢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定义。据他说：“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国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还有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

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科学界的约里奥·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科学家，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这套丛书取名知识分子丛书，就是在德布雷意义上取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有各自的专业，但是在这套丛书中，他们都写了一些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文字，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批判社会，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题。我编这个丛书有两个遴选标准：第一，要有思想。第二，文字要好。

为了这两个标准，我大费周章。如果论文字好，首选王小波、李零和冯唐。他们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欢的。借用冯唐评价文字好坏的标准，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看的时候都曾大笑。在我京郊的住所，我读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冯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差点诱发哮喘。小波的当然早就笑过。还有崔卫平佐证，她对我说，读小波的东西不能在地铁这样的地方，因为你一旦大笑，别人会以为你发了神经病，所以她说，她是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家里床上看的，看着看着就笑倒在床上。

我相信，这里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写作者。他们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视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国文坛的最佳收获，也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最高境界。我请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每人十万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估计十万字是人们耐心的极限，请不要让我后悔应当把每本字数定在八万。可以放心的是，这些作者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没的写硬写），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可惜的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套丛书最终无法收入李零、秦晖、吴思、葛剑雄等人的文字，遗憾之至。

李银河

2012年9月30日

目录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 001

启蒙的进化 / 001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 016

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和对象 / 035

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 052

在大学中成长 / 067

婚姻、女权与人权 / 075

萌萌的“精神” / 094

我与小凯 / 103

人性的地狱 / 120

张梦阳与邓晓芒的通信 / 125
答《经济观察报》马国川问 / 150
答《新闻周刊》(Newsweek) 中文月刊问 / 160
“潜规则”是什么? / 165
谁能代表中国? / 169
从霍元甲到李小龙 / 173
周洋和潜规则 / 177
大人的幼儿园 / 181
民主是要训练的 / 185
富士康的“中国模式” / 189
摩罗: 从五四到“文革” / 193
浑沌的学界 / 197
山寨中国 / 201
学界与江湖 / 205
对儒家“亲亲互隐”的判决性实验 / 209
再谈山寨中国 / 213
对强制拆迁的法律分析 / 217
后记 / 221

启蒙的进化¹

近读许苏民君的《为“启蒙”正名》一文，感慨良多。该文为纪念不久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萧蓬父先生所作，我与苏民都是萧先生的弟子，文章中所说的许多话，都是我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对萧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我们都极为尊重和崇敬。在我看来，萧先生是当代中国老一辈学人中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工诗词，擅书法，与先他两年辞世的名门闺秀卢文筠师母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诗画良缘，在今天的人听来犹如旷世传奇。然而，萧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时（1947年）的学士论文做的却是康德的伦理学。而且，我们当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头两届硕士研究生一进校，中国哲学史的指导老师萧先生给我们上的课居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1 原载于《读书》2009年第6期。

起源》及《德国农民战争》。从萧先生那独立不羁的言谈风度和经常忍不住拍案而起的狂放激情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启蒙气息和批判锋芒，这经常使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听众血脉贲张。那时的萧先生虽然不过五十出头，却已满头银发，但中气十足，声震屋宇，潇洒倜傥，令我辈惊为天人。

然而，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独特经历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再无条件地接受任何未经自己思考和认可的观点或信条，而这也正是萧先生特别看重我们这批学生的地方。当年的研究生讨论课上那种几乎每个人和每个人都发生激烈争论的场面，已经不是今天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所可以想象。记得当时我对萧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吸收西方文化，必须要有一个本土文化的“接合点”或“生长点”，否则嫁接过来的胚芽便不得存活。这实际上是萧先生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就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和西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思想的“接合点”，并从这种接合点来理解西方启蒙思想的。这个接合点在他看来主要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包括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魏晋士子的个性自由思想；最后则体现为明清之际儒道佛合流之后的一大批反专制的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它们是我们固有文化中已经出现的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相呼应的本土根芽。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一般地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不一定要在本土文化中有自己特殊的基因，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拿来”的，只除了一种基因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共同的“人性”。否则的话，那些没有道家传统或别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例如非洲土著民族）就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了解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了。至于接受了文化的传递之后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变形，这只是结果而不是接受的前提。萧先生当时并没有反驳我的这个异议，他似乎还有点欣赏我的见解。不过我们始终没有就这个问题正式展开过讨论，而只是私下里交换过意见。那时他已经以“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这一论点而蜚声于海内外，苏民兄说我给萧先生这一论点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就是这一观点，而不单是他所认为的我对“启蒙”一词的词源学解释（见苏民兄文，载《读书》2008年12期，第79页，下引此文只注页码）。

当然，我这一观点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观点，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基于文化传统中已有的共同性，而只需基于人性的共同性。但通过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及我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把这种消极的观点推到了一个积极的层次：自身文化传统中与异文化已有的共同性总是相对的，它在接受异文化的最初阶段有可能使这种接受在表层上较为顺利，然而在一定时期就会掩盖其中的差异性，成为两种文化更进一步

融通的障碍，甚至使这种接受毁于一旦；这时就需要对这种貌似共同性进行“陌生化”的再反思，发现同中之异，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向异文化学习、使自身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动力的契机。90年代，我基于这一论点又提出了“新批判主义”的文化自我批判理论，试图从我们对西方文化误解而不自知的状况跳出来，反思我们之所以不自知的传统思维惯性，建立文化批判的自我意识机制；进入本世纪，我开始对中国现代的两次启蒙运动进行再检讨，包括对鲁迅思想矛盾的分析，力图让中国启蒙思想摆脱传统士大夫要么用作政治工具、要么用于个人解气的两大陷阱（如鲁迅自我批判的：受韩非和庄子的影响，“时而峻急，时而随便”，“有时只为了和人捣乱”），而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立人”、即为个体人格建立理性基础的层次。这就是我2007年发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的思想来历。该文在苏民兄的《为启蒙正名》中成了主要批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与萧先生分歧的延续，因为苏民兄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萧先生的观点，我有时甚至把他看作萧先生的学术遗嘱执行人。

显然，我和苏民在继续高举启蒙的大旗、为思想层面的改革开放开辟道路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民对拙文的不满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夸大了中国“启蒙”和西方Enlightenment的差异性；因而我对中国这两次启蒙的评价过低，即认为这两次启蒙

都有一种不自觉的“反启蒙心态”，在理论上没有留下什么永久性的成果；其二，又因为我的评价是立足于对中国启蒙思想中传统文化印记的反思和批判之上的，所以也就是对中国明清之际启蒙这个“接合点”的评价过低。附带还有一点是，他说我“把那些热衷于统治权力的政治活动家误以为是中国启蒙学者了”，这是一种明显的“范畴错置”（第85页）。在此我想稍作一点回应和澄清，以便把我和萧先生未能展开的讨论继续下去。萧先生在天之灵如若有知，想必也会对我们这种极有意义的讨论颌首微笑的吧。

我在拙文中指出了中国的“启蒙”一词用来译西方 enlightenment “并不恰当”，这是在文化的深层背景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并没有说这个词译错了。否则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个词来译西方启蒙文献（如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了。换言之，我强调的是这两个词之间的“同中之异”。而苏民兄强调的是两者的相同。他说：

在萧先生指导我撰写的《李贽的真与奇》一书中，我遵照先生的指导，将李贽的论述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中西学者对于启蒙的理解竟是惊人地相同！……李贽和康德都一致认为，“启蒙”就是要人们

摆脱没有人在前面引导就不能独立行走的儿童状态，从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走自己的路。用李贽的话来说，就是从“婴儿”、“孩子”变成“大人”。（第80-81页）

但苏民又说：

如果晓芒说李贽不彻底，我倒是承认的，他有所谓“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于人处识取”之说，然而这种不彻底，正是萧先生所深刻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启蒙思潮中所呈现出的“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的历史惰性。（第81页）

我的确说过李贽不彻底（例如见拙文《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载《江海学刊》1994年3期），但我认为这种不彻底不是什么“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的局限性，即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李贽要人从婴儿变成大人，凭什么来变？康德是凭理性和理智，强调“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有普遍性，因为理智人人平等；李贽却凭个人的才情才性，鼓吹性情的自然伸展和爆发。这种个性要求还是朦胧的、幼稚的，它只能以“童心”的方式出现，而未能建立一

套堪与强大传统相抗衡的成熟的伦理规范，甚至也最终未能与传统彻底划清界限。李贽不赞成道学对私情私欲的一味压制，而主张任其宣泄，“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焚书》卷三，《杂说》）；但这只表明他这个特殊的个体是“性情中人”，对其他性情的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一点上，他并未真正超出传统，与道学家所推崇的“率性之谓道”（《中庸》）还有某种暗合。所以，按照他的想法，当人从婴儿变成“大人”的时候，这个“大人”仍然还是婴儿或“赤子”，他只有一颗自然赋予他的“童心”，而不具有成熟的、自律的理智（理性）。这就无怪乎他还是要把人分成等级，有“豪杰凡民之分”，天才和庸众之分，这最终与个人的天赋慧根或才情有关，而与普遍理性无关。

如果说李贽的“启蒙”主要还只是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解气”的一面的话，那么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工具论的另一面。苏民说：

顾、黄、王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们看到了现实人性中的恶主要是专制统治者治成的，是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所以一切改革都必须首先从限制君主和官僚特权的制度变革着手，而不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先把一切人的恶劣情欲都调动起